



澳门丛书

WeiLiDuo Bao Xiao Shi Mo Shu JianZheng

委黎多

《报效始末疏》笺正

◎ 汤开建 /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澳门丛书

WeiLiDuo Bao Xiao Shi Mo Shu JianZheng

委黎多
《报效始末疏》笺正

◎ 汤开建 /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汤开建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7

(澳门丛书)

ISBN 7-218-04671-1

I. 委… II. 汤… III. ①澳门—地方史—明代—史料②奏议—中国—明代 IV. K29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0686 号

责任编辑	赵殿红
封面设计	方楚涓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厂址: 台山市北坑工业开发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1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4671-1/K·933
定 价	28.00 元

服务热线: 020-83791683 (编辑部)

020-83790505 (发行部)

目 录

引言：一份重要的澳门早期历史中文文献的发现	(1)
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	(17)
韩霖与《守圉全书》	(203)
徐光启、李之藻、韩雲等人佚文	(220)
主要参考文献	(230)
附图	(245)
后记	(256)

引言： 一份重要的澳门早期 历史中文文献的发现

关于澳门早期历史的研究，近年由于不断有新的葡、西、荷等国文献的发掘与公布。使我们对过去经常争论的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有很多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这是令人欣喜的事情。相对而言，近两三年有关澳门早期历史的中文资料的发掘却有点陷入停滞，似乎已进入“山重水复”之境。然而，近日在台湾黄一农教授的帮助下，我在韩霖^①的《守圉全书》中找到了一批与澳门早期历史相关的珍贵资料，其中以崇祯元年（1628）完成的署名为“委黎多”的《报效始末疏》（以下简称《报疏》）最为重要。

《守圉全书》据韩霖自序完成于“崇祯八年”，^②刊刻于崇祯十年。由于该书刊刻于明末国乱之时，入清后又一直是国家

^① 关于韩霖事迹参见乾隆《直隶绛州志》卷11《人物：韩霖传》、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4页119—120，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第一种，辅仁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及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韩霖、韩雲、韩霞》页253—258，中华书局，1988年。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黄一农教授《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期页1—39，1996年及《天主教徒韩霖投降李自成考辨》，载《大陆杂志》93卷3期页37—42，1996年。师道刚《明末韩霖事迹钩沉》，载《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Zürcher, Erik, “Un ‘Contrat Communal’ chrétien de la fin des ming: Le Livre d’adomotion de Han Lin (1641)”, in *European China* (1993), pp. 3—22; Zürcher, Erik, “A Complement to Confucianism: Christianity an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Chang Chun-chin & E. Zürcher (eds.), *Norms and the State in China*, Leiden: Brill, 1993, pp. 71—92.

^②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首韩霖《守圉全书自叙》页2及页8。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室藏明崇祯十年刊本。这份文献承黄一农教授抄录寄赠。后我又托学生赴台从该馆《守圉全书》光盘上录制。在此向黄教授致谢。

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

禁毁之书，故该书坊间流传极少，甚至有人认为是书早已亡佚。^① 本文要介绍的《报疏》即收藏在该书卷三之一《制器篇》中。下转录全文：

住广东广州府香山县濠镜壘议事亭西洋商舶臣委黎多等谨奏，为历陈报效始末，仰祈圣鉴事。窃惟多等系西极欧罗巴沿海国土人氏，遵崇造成天地尊主陡斯规教，经商各处，入国问禁，忠信自矢，毫不敢有逾法度。远在中华西鄙九万里，自古不通贡市。恭遇天朝扫逐胡元，声播及该国，是以多等航海占风，寒暑六易。正德年间，始达广海外洋，迄今百二十年，钦承七帝。中外互市相通，每年输饷二万二千余两。迨至嘉靖三十六年，历岁既久，广东抚按乡绅悉知多等心迹，因阿妈等贼窃踞香山县濠镜壘，出没海洋，乡村震恐，遂宣调多等，捣贼巢穴，始准侨寓濠镜。比作外藩子民，授廩资粮。虽海际穷竭，长不过五里，阔仅里余，祖骸孙喘，咸沐皇恩。两季在省贸易。广海士民相安无忤，奈贼党众多，尽心捍御，协擒贼首曾一本於海上，追获逃奸林道乾於外国。多等商船往来，多警不已，请命国主，移有西洋大统保护身命。

适万历四十八年东奴猖獗，今礼部左侍郎徐光启奉旨练兵畿辅，从先年进贡陪臣龙华民等商榷，宜用大统克敌制胜，给文差游击张焘、都司孙学诗前来购募，多等即献大统四位及点放统师、通事、僱伴共十名，到广候发。比因练军事务暂停，大统送至京都，统师人等仍还归壘。天启元年，奴酋陷失辽左，总理军需、光禄寺少卿李之藻奏为制胜务须西统等事，仍差原官募人购统，而多等先曾击沉红毛剧贼大船一只于电白县，至是复同广海官兵捞寻所沉大统二十六门，先行解进。天启二年春，海贼谢天佑劫掠广海、电白

^① 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卷4期页911，1996年。

各洋，多等自备船只，捉获贼首党孽二百余人，缚送军门，金牌功票证。夏则红夷巨寇驾载大小船只五十余号，大小銃炮八百余位，聚众攻壘，即欲入犯内地，仰荷恩庇，以大銃击杀四百余人，溺水死者无算，打沉贼船二只，贼走退踞彭湖，官兵验实案卷证。伊时半载，盗寇两侵，闾壘正在戒严。多等以先经两奉明旨严催，不敢推辞，遂遴选深知火器銃师、通事、僉伴共二十四名，督令前来报效，以伸初志。随於天启三年四月到京，奉圣旨：“壘夷速来报效，忠顺可嘉，准与朝见犒赏，以示优厚，余依议行，钦此钦遵。”复蒙赐宴图形，銃师独命峨等，在京制造火药、銃车，教练选锋，点放俱能弹雀中的。部堂戎政科道等衙门，悉行奖励。随蒙兵部题请，复蒙恩护送南还。咨文称：“各夷矢心报国，一腔赤胆朝天，艺必献精，法求尽效，激烈之气可嘉，但寒暑之气不相调，燕粤之俗不相习，不堪久居於此，应令南归，是亦柔远之道也。”给劄优异，复与脚力回壘。许多等子民一视，咸切感戴。且闻天启五年，宁远城守，大銃奏功。多等报效微忱，於斯少验。岂期天启七年，红毛结连内贼，复来犯壘报仇，多等又自备船只，出外打退，焚烧贼船一只，生擒红贼三十二人，溺水者不计，解送军门，报功卷案证。续闻吕宋、满刺加等处商船报称，红夷盘据北港、大湾，离福州海面三百里，筑城建台，造载大銃大船四十号，候风犯壘，渐及中土，在在告急，随该多等申飭防御外。

兹崇祯元年七月内，蒙两广军门李逢节奉旨牌行该壘，取銃取人，举壘感念天恩，欢欣图报，不遑内顾。谨选大铜銃三门，大铁銃七门，并鹰嘴护銃三十门；统领一员公沙·的西劳，銃师四名伯多禄·金荅等，副銃师二名结利窝里等，先曾报效到京通官一名西满·故未略，通事一名屋腊所·罗列弟，匠师四名若盎·的西略等，驾銃手十五名门会鼯等，僉伴三名几利梭黄



等。及掌教陆若汉一员，系该密潜修之士，颇通汉法，诸凡宣谕，悉与有功。遵依院道面谕，多等敦请管束训迪前项员役，一并到广，验实起送。复蒙两广军门王尊德遣参将高应登解铨，守备张鹏翼护送，前来报效。伏乞皇上俯念远人两次进铨进入微功，并前次多番功绩，恳求皇恩收录忠勤，一视如内地赤子，感戴绥柔，莫大德泽。倘蒙不鄙末技，或有任委，敢不承顺，谨令统领公沙·的西劳代控愚衷，仰祈圣明鉴察，臣不胜激切待命之至。崇祯元年九月十五日具本，三年正月十七日奏闻，二十二日奉圣旨：“知道了，该衙门知道。”^①

这份署名“委黎多”的《报效始末疏》全文 1355 字（不含标点符号），应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份澳门葡萄牙人对明廷所上的中文奏章，也是第一份向明廷汇报澳门开埠及澳门葡人与明廷早期关系的最为详细的中文文献。《报疏》完成的时间是“崇祯元年（1628）九月十五日”，正式上奏的时间是“崇祯三年（1630）正月十七日”。该疏是由澳门葡人公沙·的西劳（Gonçalves Teixeira）统率葡人铨师进京时代上的，即疏中言：“谨令统领公沙·的西劳代控愚衷”。与此疏同时上奏的还有耶稣会士陆若汉（João Rodriguez Tizzu）的《贡铨效忠疏》。^② 澳门议事亭委黎多借崇祯元年（1628）给明朝皇帝进献西铨西兵之机上了一封长达 1300 余字的奏疏，历陈澳门葡人报效明朝的赤胆忠心及事迹。作为 17 世纪葡萄牙帝国仍处于发展势头的海外扩张据点之一的澳门自治政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份向明朝表忠心的文件？我认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葡萄牙人在明武宗正德年间来华，一直试图在中国沿海寻找一贸易据点，以发展其对远东地区的贸易。经过近 40 年的努力，葡人通过帮助明朝政府驱海盗，进龙涎香及收买中国政府官员等手段，终于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获得广东地方政府

① 前揭《守国全书》卷 3 之 1 委黎多《报效始末疏》页 86—91。

② 前揭《守国全书》卷 3 之 1 陆若汉《贡铨效忠疏》页 90—94。

的允肯，得以入住澳门。葡萄牙人入住澳门后，建立了以澳门为中心通往日本、菲律宾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网络，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虽然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住是获得广东政府的同意，甚至是中国政府的默许，万历十年（1582），在葡萄牙人定居澳门20余年后，澳门葡人代表还通过送礼的办法，获得广东最高地方官两广总督陈瑞的亲口承诺：“殖民地的一切将均可照旧，但是要属中国官员管辖。”^①但是，这一居住权始终没有得到法理上的保障，即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同葡萄牙人签署一个正式的文件或颁布一个正式的公文，将葡萄牙人入住澳门合法化。正是这一原因，居澳葡人始终有两大隐患：一是正因为葡人居澳尚缺乏中国政府具有法律效力文件的保障，葡人的居澳权就具有很大程度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因此，一旦中国政府内部反对葡人居澳派占上风，驱赶葡人出澳就有可能变成现实，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间，俞大猷提出要全力驱逐葡人；^②万历三十三年（1605）卢兆龙提出“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外海”；^③万历四十一年（1613）郭尚宾提出“令夷人尽携妻子离澳”。^④二是继西班牙、葡萄牙后起的海上强国荷兰开始其远东贸易，对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所获海外贸易的巨大商业利润十分眼红，希望能在澳门取葡萄牙人而代之。从1601年到1627年，荷兰先后多次进攻澳门，虽然未得手，但夺取澳门的野心于荷兰人则始终没有泯灭。澳门开埠之初，明朝与澳葡的关系时好时坏，而到万历后期，双方关系极度紧张，要求将葡人赶出澳门的呼声越来越高，“议者有谓，必尽驱逐，须大兵临之，以弭外忧；有谓濠境内地，不容盘踞，照旧移出浪白外洋就船

①（意）利玛窦（Mathew Ricci）著，刘俊余、王玉川、罗渔合译《利玛窦全集》第1卷页118，台北，辅仁大学，光启出版社，1986年。

②（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15《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道光龙溪味古书室重刊本。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册卷30《香山壘》页785，中华书局，1982年。

④（明）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1《防澳防黎疏》，丛书集成初编。



贸易，以消内患”。^①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两广总督张鸣冈才将驱葡出澳的意见否定，但双方关系仍然紧张。而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南京教案”则使这一紧张关系更为加剧。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起到崇祯元年（1628）澳门委黎多上疏前，由于明王朝在东北地区战事连连失利，万历四十七年，“三路复师，举朝震骇”；^②天启元年（1621），“沈辽暂失，畿辅惊疑”。^③一批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明廷朝臣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开始思索如何利用澳门葡萄牙人军事技术的优势改善明军对后金作战屡败之状况，不断上疏说明政府到澳门购炮募兵，欲以葡萄牙人的军事力量来对付后金的进攻，施行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而澳门葡人也希望借此机会扩大葡人在中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进而希望解决几十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葡人居澳的法理地位问题。“澳门人帮助国王（指中国皇帝）保国，国王则让澳门人继续呆在澳门。”^④这就是澳门葡人从万历四十八年以来不断向明朝进献西铕西兵的最主要政治目的。我们从《报疏》中大量的文字即可看出：“入国问禁，忠信自矢，毫不敢有踰法度”；“始准侨寓濠镜，比作外藩子民”；“祖骸孙喘，咸沐皇恩”；“各夷矢志报国，一腔赤胆朝天”；“恳求皇恩，收录忠勤，一视如内地赤子”。从“比作外藩子民”到要求明政府将澳门葡人“一视如内地赤子”。其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要求明朝政府将澳门葡人视为“内地子民”，

① 《明神宗实录》卷 527，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己未条。

②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 2《熊王功罪》页 1417，中华书局，1977 年。

③ （明）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 483《李存我集》卷 1《制胜务须西铕迭购募始末疏》页 5325，中华书局影印平露堂刊本。

④ 葡萄牙里斯本阿儒达官图书馆《耶稣会会士在亚洲》C6d. 54 - XI - 21 钞件，1646 年《呈吾主吾王唐·若昂四世陛下进言书。中国居民若尔热·平托·德·阿泽维多于 1646 年 3 月亲手交给唐·菲利普·马斯卡雷尼亚斯总督先生转呈印度议事会》，转引自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页 145，澳门基金会，2000 年。此进言书虽上于 1646 年，所言也是澳门同南明政权的关系，但透过此书，我们亦可看出，澳门葡人希望透过对明王朝的军事援助而获得葡人居澳的法律地位的心态是一以贯之的。



从而也就是从法理上解决葡人居澳的合法性问题。这就是崇祯元年澳门议事会给明朝皇帝上这一长疏的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与委黎多《报疏》同时上奏的还有另一份奏章，即曾担任澳门耶稣会顾问，^①在崇祯元年贡铎队伍中称为“西洋掌教”陆若汉呈献的《贡铎效忠疏》，此疏同《报疏》上奏时间均在“崇祯三年正月十七日”。下录全疏文：

西洋住粤劝义报效耶稣会掌教臣陆若汉，全管约铎师统领臣公沙·西劳等谨奏，为遵旨贡铎效忠，再陈战守事宜，仰祈圣明采纳事。窃臣等西鄙远人，崇奉造成天地尊主陡斯规教，颇识造物根源，最重君亲伦理。顾凡该国商舶，游历所到之处，必先令一掌教训迪，不许来商毫逾经行国法，以乖尊主陡斯规教。臣汉自本国与先臣利玛窦辈前后航海至粤，已五十余年。臣公沙自本国航海，偕妻孥住粤已二十余载。臣等耳闻目击，身亲天朝豢养弘恩，其所以图报皇上者，已非一日矣。况臣汉与先臣利玛窦（Mathieu Ricci）及今辇下臣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邓玉函（Jean Terrenz）同教同会，先臣利玛窦生蒙皇祖神宗皇帝馆穀，没蒙皇祖神宗皇帝谕葬；臣龙华民、邓玉函复蒙皇上采纳廷议，钦命修历。天朝信任宠赉臣等，何如深厚！臣汉自幼奉守尊主陡斯忠君孝亲爱民之事，敢不转相勉励！

是以崇祯元年两广军门李逢节、王尊德奉旨购募大铎，查照先年靖寇、援辽、输餉、输铎，悉皆臣汉微劳，遂坐名臣汉□贡大铎，点放铎师前来。而臣公沙亦因受恩同教，不顾身命妻孥，欢喜报效，挺身首出。故该粤臣委黎多等付臣汉以训迪统领、铎师诸人之任，责臣公沙以管约铎师匠役诸人之任也。臣等从崇祯元年九月上广，承认献铎修车，从崇祯二年二月

① 葡萄牙里斯本阿儒达宫图书馆《耶稣会会士在亚洲》Cód. 49 - V - 7，页147反面。



广省河下进发，一路勤劳，艰辛万状，不敢备陈。直至十月初二日，始至济宁州，哄传虏兵围遵化，兵部勘合奉旨催趲，方得就陆，昼夜兼程，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涿州。闻虏薄都城，暂留本州制药铸弹。二十六日，知州陆燧传旨邸报，“奉圣旨西钺选发兵将护运前来，仍侦探的确，相度进止，你部万分加慎，不得疎忽。钦此。”十二月初一日，众至琉璃河，警报良乡已破，退回涿州。回车急拽，轮辐损坏，大钺几至不保。于时州城内外，士民咸思窜逃南方。知州陆燧、旧辅冯铨一力担当，将大钺分布城上。臣汉、臣公沙亲率钺师伯多禄·金荅等造药铸弹，修车城上，演放大钺。昼夜防御，人心稍安。奴虏闻知，离涿二十里，不敢南下。咸称大钺得力，臣等何敢居功。兹奉圣旨议留大钺四位保涿，速催大钺六位进保京城。

臣等荷蒙尊主陡斯、皇上恩庇，于今年正月初三日，同旧辅冯铨送到京。除臣等恭进该畧臣委黎多等历陈报效始末一疏，并送部预先恭进大钺车架式样二具呈览外，臣等思惟皇上深知大钺有用，赐号“神威”。臣等不直陈大钺战守事宜，有负皇上九重鉴知，有虚臣等远来报效。臣念本畧贡献大钺，原来车架止堪城守，不堪行阵。如持此大钺保守都城，则今来大钺六位，并前礼部左侍郎徐光启取到留保京都大钺五位，听臣等相验城台对照处，措置大钺得宜，仍传授点放诸法，可保无虞。如欲进剿奴巢，则当听臣等另置用中等神威钺及车架，选练大小鸟钺手数千人，必须人人皆能弹雀中的。仍请统以深知火器大臣一员、总帅一员，臣等愿为先驱，仰仗天威，定能指日破虏，以完合澳委任报效至意。臣等啣感德泽，不觉言之及此。伏乞皇上俯察贡钺效用微忠，并悉大钺战守事宜。敕下该部，立覆施行。别有贡献方物，因闻陆路亟行，尚留济宁地方，容到日另疏进呈。臣等不胜惶悚待命之至。崇祯三年正月十七日奏闻，二十二日奉圣旨：

器夷远来效用，具见忠顺，措置城台，教练銃手等项，及统领大臣，着即与覆，行该部知道。^①

如果说以“委黎多”的名义上奏《报疏》，其立场是代表澳门议事会的话，则陆若汉所上《贡銃效忠疏》的立场是代表澳门耶稣会。1628年时，陆若汉已经67岁高龄，而当时耶稣会巡视员班安德（Andre Palmeiro）还同意陆氏参加这次远征，不外乎是希望通过极富外交经验与才干的陆若汉改善耶稣会教士同中国政府的关系，^②亦想通过贡銃之举代表耶稣会向中国皇帝表示效忠。在疏中反复强调耶稣会教士从利玛窦起，“身亲天朝豢养弘恩，其所以图报皇上者，已非一日”；“天朝信任宠赉臣等，何如深厚！”“臣等啣感德泽，不觉言之及此，伏乞皇上俯察贡銃效用微忠。”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说服崇祯帝在中国内地开放自由传教。因为，自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爆发后，于当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颁布禁教令，南北两京西教士首被驱逐，并“要打击全国的基督教，一举全歼”。^③万历四十八年，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这一批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官员集团开始制定一个新的计划，即通过从澳门输入西銃西兵加强明朝对外作战的军事能力，解决当时朝廷东北边境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乃欲同时招致教士也”。^④如果澳门进献西銃西兵成功，不仅“大有利于国家，尤能为教会树大功”。^⑤除此之外，徐光启集团不遗余力地输入西銃西兵，招致西方传教士，引进西方实用科技力量及西方宗教势力对中国的影响而强化与稳固自身集团在明宫中的日渐重要的地位。这一当时在文献中未予表露的语言，应是万历四十八

① 前揭《守圉全书》卷3之1陆若汉《贡銃效忠疏》页90—94。

② （英）库帕（Michael Cooper）著，松本玉译《通辞：罗德里格斯》第17章页324—325，原书房，1991年。

③ （葡）曾德昭（Alvaro Semedo）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第2部第10章页26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④ （意）巴笃里（Daniello Bartoli）《中华耶稣会史》页696，转引自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国之史料》，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1期，1944年。

⑤ （比）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621年报告》页139—140，转引自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国之史料》。



年制定这一套新计划的另一目的。而澳门议事会及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也希望通过进献西铕西兵，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来帮助明廷抵御外侮，加强以徐光启为首的天主教集团的政治地位，以致影响明朝皇帝对澳门及天主教的政策，在明廷中寻求一势力强大的政治保护伞，以保澳门的稳定及天主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这是一个一石数鸟、予惠多方的良策。曾德昭《大中国志》称：

自从头一次南京迫害以来，到这时已过了六、七个年头，而鞑靼人向中国人进行了残酷的战争，不仅打败了他们的几支军旅，还攻占了他们在辽东的若干地方：他们不知如何制止敌军的入侵。不管怎样，神父竭力想法在中国出现，公开露面，按北京来函的意见做。但他们是被皇帝的诏令驱逐。他们发现在这件事上有不小的困难。不过，基督徒们和我们的博士朋友们决定撰写一份奏疏，利用和鞑靼人打仗的事及中国人遇到的困境，上呈皇帝，首先谈战争的灾害、他们所受的伤亡损失、丧城失地，花费无数钱财和丧失人马，未能在多年时间里避免或制止那场战祸。其次，他们指出驱逐欧洲神父所犯的错误，神父们有德行、学识，是能胜任大事的人，此外他们也是精通数学的人，无疑地在国家面临困难时有秘方奇策供他们优先采用，如果神父们如以往一样仍在朝廷，他们有能力使形势得到好转。最后，他们称，神父们或许尚未全部离开，那么多的人不能经过许多秘密险道走出这个大国，陛下最好下旨在全国进行认真的寻找，以便发现仍有留下的神父，遣往朝廷，那么他们可以在此战争之际为陛下效劳。^①

曾德昭所指“我们的博士朋友们”应指徐光启、李之藻这一批已成为天主教徒的明廷官员。徐、李集团的新计划初步奏效，奏章上达天启帝后：

^① 前揭《大中国志》第2部第12章页283—284。



皇帝立即赞同，把它转交兵部，兵部不仅支持这个计划，还补充说，他们深信，神父们以其数学技艺，将能迷惑鞑靼人，令敌人不能用武装攻击他们。于是兵部很快下令，尽可能积极寻求神父们，但这不需费力就找到他们。……当时住在南方的总监罗若（如）望（Jean de Rocha）神父很快得到皇帝诏令的消息，还要他派两名神父去北京。很难想象在神父们和其余基督徒中引起的欢乐，他们知道，神父们公开返回中国传布福音，这是最确定的途径，他们可以如前一样享有自由。龙华民神父和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神父被提名作这次旅行。^①

据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远方亚洲》记载，在天启元年（1621）九月十日之前，两广总督接到北京的命令后，即派人入澳索要传教士进京：

接总督谕，内称接北京兵部命令及内府总管私函转有玉玺的圣旨，命令向该城诸官索要 100 名精兵及数名优秀炮手及文士（传教士）。他们是当年在华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同伴，他们无罪，但被驱逐出国。召上述众人进京，为皇上效力。我立即执行此令。^②

中文文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天启帝允许“神父们公开返回中国传布福音”的记载，但有些奏章中已透露出这一相同的信息。李之藻天启元年的奏章中称：

如果臣言可采，伏乞圣明俯允，敕下兵部复议停妥，马上差人填给勘合，一面前往广信府查将原寄大铕四门，督同张焘陆路押解来京；一面前往广东赉文制按衙门，转行道府，招谕前项善能制造点放夷目诸人，仍前赴京报效；及将阳玛诺神父，一面出示招徕，

① 前揭《大中国志》第 2 部第 12 章页 284—285。

② 阿儒达官图书馆《耶稣会士在亚洲》Cód. 49 - V - 2 号手稿，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远方亚洲》第 6 编第 3 章页 80—91。



以广群策。^①

兵部尚书崔景荣天启元年五月的疏章则称：

惟是诸器之素所信服者，西洋陪臣阳玛诺、毕方济（François Sambiasi）等，皆博涉通综，深明度数，并笏同来，商略制造。^②

明廷通过兵部直接调西洋传教士阳玛诺、毕方济进京，完全可以说明万历四十四年颁布的禁教令已经解禁，神父们已开始获得“公开返回中国传布福音”的允许。但天启二年进京的不是阳玛诺和毕方济，而是阳玛诺与龙华民。此事在卫匡国（Martin Martini）的《鞑靼战纪》亦有记载：

两个可尊敬的基督教士保罗（应译作保禄，指徐光启）和米歇尔（应译作弥额尔，指杨廷筠）设法劝说皇帝向澳门的葡萄牙人借用更大的火炮和更多的炮手，希望借此使被驱逐的基督教神甫回来恢复传教。他们的建议产生了效果。两人被派往澳门。神甫们可以公开传教了。^③

明廷对天主教的宽容与开放使久经教禁的基督徒们刚刚喘过一口气，然而，天启二年（1622）五月，“白莲教起义，沈（淮）之党即诬天主教与白莲教同，又请朝廷禁传”。^④这时天主教的死对头沈淮由于与当朝宰相方从哲“相善”，官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又与太监魏忠贤勾结，权倾朝野。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断攻击徐光启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又唆使其党徐如诃、余懋孳等诬陷天主教与白莲教同，并指控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为邪教魁首。在这种情况下，徐光启被迫辞职，李之藻被

① 前掲《明经世文编》卷483《制胜务须西统敬述购募始末疏》页5327。

② 王重民辑《徐光启集》上册卷3《练兵疏稿》2《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附录2《题为制胜务须西统敬述购募始末疏》页18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③ （意）卫匡国（Martin Martini）著，戴寅译《鞑靼战纪》，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页1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④ 方豪《李之藻研究》之《李之藻先生简谱》页204，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

调出北京到南京任职，次年告归，^① 传教士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希望遂破灭。巴笃里（Daniello Bartoli）《中华耶稣会史》称：

葡人除炮手之外，一概不许入境。时有教士十二人又准备偕葡军同来，以便分赴各省成立新教区。至是，遂被剔除。^②

这一次禁教时间不长，前后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是却给耶稣会传教士一个警醒，在中国传教，如果没有明廷上层强大的政治势力的支持和保护的话，欲求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崇祯三年代表耶稣会向崇祯皇帝上的“效忠疏”其目的就是要获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接受与认可，获得自由传教在中国内地的切实保障。应该说，这一次耶稣会的贡铎效忠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巴笃里书载：

中国教会因彼（指庞类思 Louis Gonzalez 及邓玉函 Jean Terrenz）之死所受之损失，赖本年（1630 年）十月日五教士之来华，得一部分补偿。其中义大利籍者二人，即 Tranquille Grassaetti（谢贵禄）与 Pierre Cunevari（聂伯多）；葡萄牙籍者一人 Benoît de Mattos（林本笃）；法兰西籍者一人 Etienne Feber（方德望）；弗拉芒籍者一人 Michel Trigault（金弥格，乃金尼格之侄）。彼等之入境也，不如以往之须采用秘密方式，乃系公然而行，且不衣葡装，盖其时澳门适有大炮十尊进呈明帝之举，教士辈遂受其惠。^③

当时记录此事的曾德昭称：

通往福音之门打开了，归化异教徒之路平整，上帝鼓励我们做的事业没有遇到阻力和对抗。^④

同时，以徐光启为首的天主教官员集团的政治势力大增，崇祯

①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卷 4 页 106，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本，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 年。

② 前揭巴笃里《中华耶稣会史》页 771—772。

③ 前揭巴笃里《中华耶稣会史》页 961。案：《东方杂志》刊登方豪译文，其中西文人名讹误甚多，此为订正后的西文人名。

④ 前揭《大中国志》第 2 部第 12 章页 285。